



见过龙头村那幢旧居者，或说那幢土坯农舍，对一个既对建立中国建筑的古典主义传统有终身追求，又对中国古代建筑从不顾及永久性持批判态度的建筑史学家，有一种“强烈的讽刺性和悲剧性”；或作浪漫怀想：推算起来，屋主的丈母娘当年恰少女情怀呼之欲出的年纪，锦衣玉食，十指不沾阳春水；抚摸着林徽因的梳妆台，照见镜子中自己将熟未熟的青春，比起她见到的那位江南美人，顿时沮丧得想哭……

我没有那样的理性和浪漫，有的只是感动与景仰。国难当头的严峻年代，建那幢房子前后，林徽因虽为云南大学设计过映秋院，梁思成却按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之嘱，虽五易其稿，临了却只能设计建盖几幢茅草屋顶的校舍。如此，他们何以决意耗尽积蓄，盖个那样的院子，还特意设计了一个“大”客厅？

其实，历经颠沛流离，从北平、长沙一路走来的梁林夫妇，到昆明后，最先借住于巡津街的“止园”，后又搬到巡津街9号。那一带紧靠1910年通车的滇越铁路火车南站，稍显繁华。那时，金岳霖、杨振声、萧乾、沈从文各家，亦先后到了昆明，住的离梁林也不远。如是，曾被某些小家子气文人讥诮的“太太的客厅”，或“太太沙龙”，亦在昆明恢复重启。少为人知的是，经常光顾昆明那间“太太的客厅”的，除了文化界的新朋旧友，还有一群年轻的空军航空兵学员。

那是从长沙来昆明路上，在湘黔交界处的晃县，梁思成为给病中的林徽因寻个住处，由一阵优美的小提琴声导引，意外结识的。其时的昆明航校位于南郊的巫家坝机场，年轻学员远离家乡亲人，训练艰苦，生活枯燥，很自然地，就把梁林的家当成了自己的家。逢有假日，他们便相约来此聚会。当林徽因的三弟林恒作为航校第十期学员也来到昆明，那份友情便变得更为亲密。

无论对一个人，一个民族，建筑从来都是文化心理的空间投射。倘佯在那间客厅，我总会想起，热情好客的梁思成夫妇，跟那些年轻人作老友般闲聊的温雅与深邃。客厅的实体空间怎么都不算大，思绪的漫漶却可至无垠。《小窗自纪》谓：“忘形之交，唯有识性。”而至情至性，不在挥麈雄谈，倒是执手细语。以梁思成林徽因当时的境况，每有客至，玉盘珍馐当无，粗茶淡饭或有，真能拿出的惟有一份温馨。年轻人常向他们掏心掏肝地倾吐无处诉说的心曲，他们则在百忙人生中，驻足倾听年轻心灵的跳动，还报那些热血骁勇以激赏与挚爱。余生也晚，无缘加入那场世纪凝目与家居闲聊兼具的恳谈，偶尔便浑忘现代，兴味突发，想那客厅如何转瞬便成了年轻

人宁静的生命港湾，梁林夫妇察世的瞭望窗口，方明白为何无论梁家搬到哪里，年轻人都会追随之。借住于北郊麦地村一个尼姑庵时，屋里潮得能浸出水来，须撒些石灰方可落脚，“太太的客厅”或就在屋外石青苔绿的天井；当他们谋划自己盖房时，一个宽敞的客厅，就成了必须。

转眼，那些年轻人便要从航校毕业，编入对日作战部队。学员中没人有亲属在昆明，便请梁林夫妇做“名誉家长”，出席在巫家坝机场举行的毕业典礼并致词。那天，梁思成全家都去了。坐在主席台上，看过毕业生的飞行表演，眼见那些年轻朋友就要驾着老旧如古董的“老道格拉斯”飞机出征，一种说不出的酸苦和忧心，已让他们心情沉重。

飞行员们偶然还会来到梁家，讲些战斗故事，还给他们孩子带来过用日机残骸制作的玩具。这时的客厅聚会，欢声笑语渐少，气氛日现凝重。说起空战中我方的劣势和一些老飞行员的牺牲，他们的揪心和忧愤，总让梁林夫妇担心，某些可怕的事情，随时都会发生。

噩耗很快传来。梁思成突然接到部队寄来的一封公函和一个小包裹——公函是一份阵亡通知书，包裹里是些日记、信件和照片。死者正是那群年轻飞行员中牺牲的第一人，因后方没有亲属，遗物便寄给了“名誉家长”梁思成。林徽因捧着那些东西泣不成声。孰料那样的悲伤后来竟接踵而至，将阵亡者遗物寄给他们夫妇二人，也成了那支部队的惯例。

想想，真难为了梁林夫妇，民族危亡之时，也跟全中国老百姓一样，经受、承担着那份伤痛；可任有再宽敞的客厅再四海的心胸，又怎么装得下如许悲伤？此后无论家在哪里，每年“七·七”事变纪念日中午十二点，梁思成全家都要在饭桌旁起立，默哀三分钟，悼念他们认识和不认识的抗日烈士。那三分钟是他们全年中最严肃庄重的一刻。

时局动荡，梁林夫妇只在那幢屋子住了短短8个月，就无奈离开昆明，去了重庆李庄。幸好老屋和客厅犹在，留给我们无尽的沉思。如今豪宅、会所随处可见，缺的恰是真能让心与心对话的去处，什么时候，才能让更多人走进那个“客厅”，听听梁思成林徽因抚摸过的每道门每扇窗每片地板每块墙砖的诉说，也听听我们自己？